

大理白族史探索



▲
大理白族史探索
▼



张
旭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5.153

责任编辑：李惠铨

封面设计：孟嘉福

大理白族史探索

张旭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字数：171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2-00591-9/K·111 定价：3.50元

前 言

我小时在农村，只知道有讲白语与汉语的两种人，稍长大后进小学，才知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五族之外，还有这么多的兄弟民族，特别是白族也是其中之一，根本没有想到。我第一次被称为兄弟民族是1938年10月在陕北学习时一次学习讨论会上。我当时非常感动，但我说不明我的族称，更谈不出我们民族的历史。这又使我感到十分惭愧。其实，当时我国少数民族特别是居住在西南边疆的人口不多的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有几个能说得清自己的族别和族史？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了大批的学者专家对少数民族进行研究识别，有些少数民族的归属到现在还在争论。白族的自称，自古就是统一的，汉唐时称“拜”、称“封”，都是“白”之转音。但定为白，则是建国以后的事。至于族源问题、语言系属问题，GM血型分类，以及其它若干历史问题，到现在还各说不一，需要以后继续深入探讨。

解放战争后期，我们工作发展到怒江，在那里我初次见到白族支系：白人，我很惊讶也很高兴。他们说：“我们是真白人。”我问：“我们呢？”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你们是汉白人。”这使我更加惶惑不解！在那里，同他们朝夕相处，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感到他们确是“真白人”，这是说他们在文化方面保存了很多的白族的原始的古东西，相比之下，我们的汉文化影响的确比他们深得多。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一座历史博物馆，我在那里亲眼看到白族的古代史，而且都是活人活事。可以说，怒江白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以社会发展的阶段计

算，我们中间有好多个世纪的差距。但他们很幸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我国各民族大家庭里，用不到半个世纪，即到本世纪末，就可赶上我们了。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在洱海地区早已经历过，但已说不清了的古代，他们提供给我们活的事例。当然，他们那里无法解释的某些问题，与洱海地区相类似的事例一对比，也就明白了。比如家长奴隶制的问题，在洱海地区早已消失了，但建国前夕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还有残存。我们碧江县政府建设科长麦阿路，是奴隶出身。我的警卫员贵保是我们手里解放的奴隶。督夺洛虎家大头人阿恒扒，我见他时已八十多岁，他本人和他儿子、女儿，共有100多名奴隶，解放那年督夺洛雨水多，庄稼无收成，没有吃的，我们还救济了他。我们有一个村长，他夫妇俩和岳父来朵，都是在白族奴隶主家里受够了苦的奴隶。他们对共产党毛主席和汉族老头哥的真挚的感激心情，我们难以语言形容。又如白人的姓氏问题：西南少数民族，包括白族，原来就没有汉式的姓，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白人也如此。白人是分虎、金鸡、木等三家。这三家在洱海地区也还有残存，如那、罗、陆三姓是虎家，黑、高、奚三姓是金鸡家。现在大理、洱源、云龙、兰坪有不少村子叫鸡邑、鸡登、鸡村，无疑与金鸡家族有关系。木家可能与段白王家有关系。原碧江县第四区树母大的木家，他们传说是从剑川羊岑乡大村搬进去的，这个村里，就有不少人姓段。而段白王家传说，他们祖先是从小肚子生出来的，与这里木家的传说完全相同。

白人还有蛇图腾传说，但我们在碧江没有追寻到蛇家，洱海地区也找不到影子。但《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和《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上都有《西洱河神图》，画的是两条大毒蛇，公蛇在上，母蛇在下，两蛇用身子围成一个圆圈，头和头，尾与尾相绞，有相互求性之姿态。公蛇旁有一条金鱼，白头，头上有红缨，眼睛瞄准着对面的白玉螺。白玉螺长条形，很像女性生殖器，平躺在母蛇

身旁。人们都只说西洱河神是金鱼、玉螺，没有提到蛇也是神。蛇是不是神呢？我们看怒江白人保存流传下来到现在还使用的白族《十三月制》古历法，规定每一新年之起头一日（元旦），必须是蛇日，这无疑是对蛇之尊崇，不能说与蛇图腾无关。我问过朵兮薄恒扒翁，他只说蛇是长寿之象征，对蛇的尊崇是祖宗定下的规矩，不能改动。而蛇是生殖之神（女娲氏也是人首蛇身），农业之神，财帛之神，也是医药、护卫之神，这在许多民族也包括白族神话传说里面，可以找得着描述。大理海东洪山本主就是蛇神，他保护海上来往船只平安、渔业丰收。以1985年4月15日会期为例，那天来赶会的渔户和游客达25 000人次，几乎洱海周围的渔户船家都来谢神了。而这位蛇神又与大理国王段氏同姓，这就更有意思了。可以说明古代西洱河的主神应该是蛇。当然金鱼玉螺也是白族供奉的神灵，这是自古已然，不是自现在始。只是在龙文化传入以后，大家才崇龙不再崇蛇。但从白族的蛇图腾传统和崇蛇的情况看，白族在古代无疑是有过崇蛇文化，而今天也还有残存。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白人称火把节为“作花船”（意译），这在山高水急的怒江大峡谷里是无法解释的。但这恰与大理市海东乡的火把节在洱海上竞赛“作花船”同一语词。说明白人是从洱海边上迁移到怒江高山峡谷里，无法“作花船”了，但这个名词还是同大理海东乡一样作为对火把节之称而被保存下来。又如大理市的“绕山林”（剑川的绕海会也相类似），白语叫“观花南”，同怒江白人的“观南侯”一对比，就可知道大理的绕山林、剑川的绕海会，即从古代白族先民的“串公房”演变而来。只不过说，洱海地区佛教盛行，绕山林、绕海会已带有很浓厚的佛教色彩，但其内容则还有青年男女“串公房”的遗俗。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根据《张氏国史》绘有张乐进求在铁柱边祭天图，参加的共九人，其中西洱河右将军杨农栋、左将军张矣牟栋、勋公大部

落主段宇栋等三人名字末一个字都是“栋”，不得其解，后来见怒江白人三字名的一字也是“栋”，如六三栋、九官栋、普士栋等，经他们解释，这是对男子之美称，有英俊之意。说明今天的白人还保传着他们的祖先唐代河蛮大姓的取名方式。其他如很可贵的白族《十三月制》古老历法，在洱海地区还有点残存，但很快会消失完了，而在怒江白人这里还完整的保传下来，现已引起国内外天文学界的重视。在原始宗教方面，对“天鬼”和“白崖皇帝”的崇拜，他们也保存得比较系统完整。

在怒江住了整10年，主要是探索了白族古代历史文化方面一些问题，20年后我又回到白族的中心地区大理工作，又给我广泛接触社会经济发展较高的洱海地区的白族历史文化的机会。回到这里也10年了，我将怒江和洱海两地的白族文化作过一些对比研究，白族历史上的有些问题更看得清楚一些。从怒江州督督洛村白人大奴隶主阿恒扒到洱海之滨的喜洲乡杨、董等诸大姓的工商业资本，是一幅活的较完整的白族社会发展史，这在我国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中，虽不能说是独一无二，也是很少有的。

大理是我国历史文化名胜地区之一，它曾是唐、宋两代南诏大理立都之地。从皮罗阁进驻太和城封云南王，到明初彻底夷平羊苴咩城止，共历650年，是云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历来为中外人士所瞩目。由于元末明初的战乱，南诏、大理“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民族文化几濒毁灭，留传下来的文献，现在能见到的正史，除《唐书·南诏传》略详，《宋史·大理国传》仅六百多字。他如《南诏野史》、《白国因由》、《焚古通》等类也只寥寥几种，也不是全面而有系统的写南诏大理的历史或故事，论者无不引以为憾！建国以后，地下文物陆续出土，民间保藏的文献也时有发现，国内专家学者对云南古籍和地方志的整理也有进展。更难得的是对南诏大理的研究和对怒江、澜沧江两流域的白族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调查研

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视和资助，并特派研究员詹承绪、刘龙初、修世华等三同志两次专门前去作抢救性的调查，收集到极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今后全面研究白族历史文化，会有很大帮助。

白族从6世纪到14世纪末叶，约有七八百年时间是云南的主要民族，其势力曾影响到我国整个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近年来，国际上史学界已开始注意到对白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从事研究的人员也逐渐多起来，这也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可喜现象。

历史是前进的，白族也在前进。白族史的研究也必须前进！

张 旭

1988年12月20日

目 录

前 言	(1)
…	
白族四千年	(1)
从白族的自称和他称看其族源	(24)
楚人不是白族的先民	(41)
论“昆明夷”	(54)
白族的原始图腾虎与金鸡	(59)
怒江白族的蓄奴制	(72)
南诏西洱河蛮大姓及其子孙	(81)
南诏浪人子孙的下落	(102)
论南诏王室父子连名制	(119)
佛教在南诏、大理的盛行与白族文化的兴起	(133)
附 大理佛教密宗大事简表	(141)
白族对天鬼和本主的崇拜	(156)
剑川石钟寺石窟“阿媵白”试释	(163)
白族的古历法	(169)
羊苴咩、点苍山考释及其他	(180)
喜洲释名	(192)

漫谈白族舞蹈·····	(196)
赵藩的青少年时代·····	(200)
《云南丽江府剑川州西厢西中户籍册》后记·····	(210)
《龙神话传说》序言·····	(216)
后 记·····	(219)

白族四千年

一 族源和形成

从璀璨众多的文物古迹不难看出，白族是一个有四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也是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高原湖泊群边的土著居民之一。她主要有三个支系，都崇尚白色，故自称“白”、“白人”、“白子”等。三个支系，即他称的“民家”、“那马”、“勒墨”三大部份。其中民家人约占95%，那马人约占3.5%，勒墨人约占1.5%。由于白族长期与许多民族毗邻而居，其他民族对她的称呼除民家等三个他称外，据调查，有15个民族对白族的称谓多达60多种，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类：一是带白字的他称，约有12个，如白尼、白衣、白特、那白、白蛮、拜、兵章……等；二是带虎字的他称，约有22个，如那马、勒墨、拉哺、娄哺、娄本，娄比、农比、洛罗、阿罗、罗宜、腊本、腊扒……等，都含有虎意，是对以虎为图腾的白人的称谓；三是带鸡字的他称，约有6个，如阿盖、盖候、腊盖、络盖、盖特扒、勒季等，是对以金鸡为图腾的白人的称谓；四是汉语和汉文献记载的他称，约有10多个，如民家、昆明夷、昆谿夷、谿蛮、西洱河蛮、河蛮、七姓民、僰人……等。其他民族还有称白族为大容、贺、火、乎、谢大理、苟谿苴、水苴、妙、妙巴、阿撒……等。必须指出的是，汉文献中的夷、蛮、僰等，都是当时统治阶级文人对白族先民的贱称，这是必须予以澄清的。

白族居住地的自然环境和近年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表明，白

族不仅是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而且是这一带种植水稻的古老民族。白族先民居住地区虽然地处横断山脉，但这里分布着许多小湖泊、小盆地，气候夏凉冬温，雨量充沛，草木茂盛，禽兽繁多，有鱼有虾。平地可以种植谷物、饲养牲畜，山区可以采集、狩猎。这里还有很多盐泉供人食用，多种金属矿藏供人冶炼、制作用具。而有利的地理环境，如山高谷深，原始森林密集，交通险阻，易守难攻，使之成为古人类最理想、最美好也比较安全的生息繁衍之地。但人类日渐发展、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这里又成为极端闭塞、发展停滞之区。

这些年来，在以洱海为中心直径200公里范围内，已经发现或发掘出新旧石器、金石并用和青铜器遗址八九十处，其中宾川县白羊村、剑川县海门口、祥云县大波那三个遗址出土的文物最为典型，它表明同一类型的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遗址所在地，自古以来都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区。宾川白羊村出土文物516件，除大量手制陶器和部份石器外，还有猪、狗、牛、羊以及其它野兽的骨、角、牙器和蚌器，还有土坑墓34座，屋基11座，屋基内发现23个窖穴内有稻谷遗迹。大理海东石棺墓又出土陶甗（蒸谷物用的）。这说明，这里的居民，当时已开始经营农业，并已形成长期定居的村寨。经测定，该遗址距今约4 000年，相当于夏王朝的早期。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文物近1 000件，其中陶器475件，石器169件，铜器14件，其它骨角器六七十件。出土文物中不仅陶器最多，而且还有制陶工具。陶器中网坠特别多，还有铜钓钩，说明这里的居民也从事捕鱼。铜器虽只十余件，却同时出土有麻石制作的铜范，其形状和纹饰与斧完全相同，可见已能自己冶炼制造铜器了。时期稍后，沙溪寺登遗址出土的铜器就更多了，还有斧、剑等铜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遗址的四个地点发现了谷物，有稻穗、麦穗、稗穗，尖芒仍然存在，颗粒形象不乱。房屋为干栏式，五分之四建在水上，出土的大门设在陆地一边。

这样的水上住宅，既卫生，又便于防卫。在水上掘出柱桩224根，沿水流的一面略排成“一”字平。这无疑是一个水寨遗址，而这样的水寨，在海门口遗址所在地的剑湖周围和洱海东面都有多处发现。该遗址距今约3 200年，相当于商王朝后期。大波那出土一具以楠木为荐的铜棺，棺重达300多公斤。棺盖系两块尾脊式的人字形，棺底铸有12支小垫脚，其形状有似今日怒江地区白族和怒族的干栏式住房。棺上饰有鱼鹰、燕、虎、豹、鹿、马，以及三角形图案等纹饰。随葬品90多件，绝大多数系青铜器，其中有锄、铤、矛、剑、钺、尊、杯、勺、豆、斧、匕、杖等器物，有铜鼓、钟、葫芦笙等乐器，还有房屋、牛、马、羊、猪、鸡等模型以及其他饰物。该墓葬距今约2 40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大波那出土的文物表明，当时白族先民已经跨入有“常处”，有“君长”的家长制社会。白语称大头人、大家长为“大波”，墓主人显然是当时“君长”式的人物，面铜鼓铜杖则是行使其权力的象征。

到了两汉时期，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理一带是当时中国与印度之间交通线上的中点站，北经四川成都到长安、洛阳，东通滇黔和楚地，到达楚都郢；东南通交趾和粤；往西通过永昌（保山）、腾冲进入缅甸，然后到达印度。前几年长沙楚墓葬中出土的琉璃珠，无疑是由此路而来。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所见的蜀布、箠竹杖，也就是经过这条路线出口的。因此，张骞从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建议，可以经蜀（四川）、昆明（大理）直达印度，交通近便，有利无害。武帝乃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至滇国，派人到这里联系，但皆为嵩、昆明人所拒，未达成协议。后来，汉王朝降服滇王，在滇池设置益州郡，复赐滇王尝羌印，使复长其民。始将在洱海地区设置的叶榆（大理）、邪龙（巍山）、比苏（云龙）、云南（祥云）四县并入益州郡，进行羁縻。这是洱海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

朝管辖的开始。从此，由四川或楚地到达印度的道路随之畅通。昆明大观楼孙髯翁之名联所说的“汉习楼船”，就是指汉武帝开通昆明（当时指洱海）到印度的故事。西汉以后，随着汉文化，特别是铁制工具的输入，促进了洱海地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从大理市大长屯东汉墓出土的陶制水田模型来看，不仅有蓄水塘和闸门，塘内还有水产养殖，说明当时洱海边上的农业经营技术已经相当高了。随着农业经营的发展，同时也巩固了大姓^①、头人等的统治地位。他们在经济发展、力量增强之后，就以本民族利益护卫者的姿态，找寻机会，反对中央王朝的统治了。

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兵南征，对个别敢于反抗的头人是刀下不留情的，但对大多数有威望的民族领袖，则一直采取安抚、攻心的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七擒七纵孟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不仅使诸葛亮本人在少数民族中享有崇高的声望，把他奉之若天神，给这一地区也带来了安定的局面。蜀汉统治的50年间，为了便于管理，将叶榆、邪龙、云南三县从永昌郡中划出，加上越嶲郡的遂久（丽江）、姑苏（永胜）、青蛉（大姚）等共七县，另立新的云南郡，郡址设在今祥云县云南驿。这一建置，几乎把洱海周围白族先民所分布的地区归并在一郡之内，对以后白族先民各部落之间的团结，对洱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白族的进一步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的是，在蜀汉时，白族先民东西洱河蛮，简称河蛮，开始有了汉姓。据《南诏野史》记载，汉代在白崖（在今弥渡）地区有一位叫仁果的酋长，被部落成员推为王，并以其地名称其国为白国。诸葛亮南征，加封仁果之26代孙龙那佑为王，赐姓张，故又称张龙那佑。张氏为白崖之大姓。张龙那佑之17代孙张乐进求，被唐王朝封为三赅白大将军、西二河侯、云南国

^①大姓，系指当地土著势力，称雄的豪强。

诏。当时有《张氏国史》一书（今佚）。后来有的文献把大白国写成“拜”国，又出现了“大封民国”。实际上，大封民国即大白民国，也即大白国、白国，大封人也就是大白人^①。

西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各王朝自顾不暇，云南大姓，特别是滇池以东的大姓，互相争雄，最终归并于寸氏^②。后又分为东西两寸。洱海地区虽然仍是大小部落数十百个，但在中原混乱的两百多年间，这一地区的白族先民部落，相对得到安宁，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有一定的发展和提高，有的地方已经达到与蜀相当的水平，为南诏的兴起创造了物质经济基础。

二 南诏大理的兴起

唐代初期，洱海地区有数十百部落群，无大君长，不相统率，出现了几个势力较大的部落集团。在洱海以北，以浪人势力为主的有浪穹、施浪两诏^③。后来，浪穹诏主之弟丰咩袭夺了施浪诏的邓賧，自称邓賧诏。洱海以东，今宾川一带出现了越析诏。洱海以南，今巍山坝区，古称阳瓜州或蒙舍川的蒙姓，建立了蒙舍和蒙嵩两个诏。由于蒙舍诏在南，又称南诏。其实，此时，除上述六诏外，在今下关一带还有石桥诏，凤仪有石和诏，但都是小诏，人数不多，地区不广，势力也小。至剑川的剑浪诏、漾濞

① “拜”、“封”二字，古读音相通，俱读“邦”。今怒江州贡山一带的藏语、怒语均称白族为“兵章”，意为“白人”。“兵”与“封”音更近。

② 寸，又写为爨。

③ 诏有三种不同解释：一说指一片地方，一群人，一族人；二是民族的“官种姓氏”，凡是“官种”都可以称诏，诏即载瓦人和阿昌人的早，音相通；三是南诏发展起来以后，才说诏即王。⁴

向漾濞诏是浪穹、蒙嵩二诏失败后才起来的。这些由部落集团形成的诏，大者所辖约当现在的两三个县的范围，小者如石桥、石和两诏，刚不过一二个区的面积，与此同时，在洱海周围和以东地区，还有人众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西洱河蛮组成的云南诏，这是在这一地区比较大的一个诏了。

公元471年，西洱河蛮阳瓜州刺史蒙俭叛乱，唐王朝调集20万大军，并令云南国诏张乐进求所部和蒙舍诏细奴罗、罗盛父子所部的地方民族武装进行配合，苦战了三年，才将叛乱镇压下去。经过此次战争，力量最强大的蒙嵩诏衰落了，而人少地狭的蒙舍诏，由于在平息叛乱中出了力，得到唐王朝的支持和信任，逐渐强盛起来，后来并吞了蒙嵩诏，成为蒙舍川之主。

下世纪以后，吐蕃势力逐渐强大，南下与唐王朝争夺金沙江河谷，直接威胁着唐王朝在洱海地区的利益。此时，洱海以外的浪人，怨恨唐王朝姚州都督李知古杀了浪穹诏主之弟邓赅诏主半咩，便倒向吐蕃，引导吐蕃军突袭姚州，杀了李知古，并以其尸首祭天。唐王朝为了抵制吐蕃南下，势必欲首先消灭洱海以北之浪人各诏。在自己兵力有限的情况下，一方面决定大力支持南诏，对它进行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考虑到河蛮在洱海地区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必须取得他们的支持才能有力同吐蕃进行斗争，因而对河蛮采取了团结联合的方针。这个时候，西洱河地区的各部落首领，在这一地区的盟主云南国诏张乐进求的率领下，于铁柱旁祭天，举行了一次政治会盟，将盟主的地位，让于南诏王巍峰刺史蒙逻盛。这次盟会和唐王朝支持南诏、团结河蛮的方针，为南诏的兴盛和各部落的团结统一，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也对以后河蛮的兴盛，作了有益的工作。

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先后并吞、消灭了蒙嵩、越析、石桥、石和、邓赅、浪穹、施浪等诏，南诏王皮罗阁也由巍山迁到地势险要、条件优越，曾为东西汉王朝所重视和经营过的这一地

区的军事要地西洱河赋，并建都于河蛮的太和城（今大理城南）。从此，洱海地区出现了自古未有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皮罗阁被唐王朝赐名蒙归义，封为云南王。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势力强大以后，并没有按唐王朝意图与吐蕃对抗，而是继续扩充势力，向东染指滇池地区。这就和唐王朝发生了矛盾，对唐王朝在滇池地区和安南的军事部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终于在天宝年间爆发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南诏王阁罗凤在此形势下，被迫又与吐蕃联合，在西洱河大败唐军，唐军主帅李宓也投江自杀。这就是史家们所称的“天宝战争”。阁罗凤还接受吐蕃封号，称“赞普钟”（意为藏王弟）。可是时过不久，到异牟寻时，吐蕃又威胁到南诏的利益，南诏又反过来与唐朝使臣在苍山神祠会盟，联合起来把吐蕃势力逐出了金沙江河谷。以后，吐蕃内部局势混乱，已无力再南下争夺金沙江河谷了。于是南诏与唐王朝时战时和，并曾三下交趾、四入西川，派兵救援缅甸，击退狮子国兵，俨然成为中南半岛上的军事大国。这是南诏最强盛时期，其所辖版图，远远超过今日云南全省范围，洱海地区也成为当时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南诏政权有一套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南诏王室和主要文武官员，都是西洱河蛮，白族的先民。南诏统治者虽然好武，四出征战，但也能尊贤重士，注重发展生产，和外地通商，团结安抚各个民族集团，在统治区内，不少时期，真是鸡犬无惊，鸿雁不作，一片太平景象。这时的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特别是金属的冶炼和制造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南诏时有名的铈鞘、浪剑、郁刀等，精良锋利，尤以浪剑为最，故剑川即以此命名。这种高超的技术，一直延续到大理国时期。后来驰名的大理刀，就是制作浪剑工艺的继续和发展。大理刀与大理马齐名，是当时洱海地区和南宋交换的重要商品。

由于南诏统治者的倡导和支持，佛教在洱海地区十分盛行，